

戴颖,“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研究及影响因素研究(1991—2006年)”,《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48—54页。

## 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1991—2006年)

戴颖

【摘要】联合国投票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中美双边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考察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对三种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冷战结束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主要遵循了两国在既定议题的政策原则,没有受到两国综合国力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和中美关系波动的影响,这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两国没有把联合国大会作为大国博弈的场所。

【关键词】联合国大会;投票一致率;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8)02—0048—54

### 一、引言

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成为两国在国际社会频繁接触的重要场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重视并加强了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那么,在联合国这种多边场合,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什么特点?两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一致率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分享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是考察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投票情况的重要指标<sup>①</sup>。分析中美在联合国的投票一致率,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规律,更好理解两国的联合国政策,另一方面,对于深入研究中美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国会和政府对联国资料的需求推动了学术界对联国的投票研究和数据积累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sup>②</sup>。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联合国投票情况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伴随着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兴起而发展,大多运用统计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政策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分析,主要关注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否能够影响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sup>③</sup>。但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针对美国与多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也就是一对多的研究,而缺乏针对双边投票行为的研究,很少探讨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投票行为。因此,分析中美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以及影响两国投票行为的因素成为很有意义的课题。

<sup>①</s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to Congress on 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85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c., 1985), pp.1-3.

<sup>②</sup> 从1946年起,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开始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与联合国》及《美国参与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国会也举办相关听证会,发布《美国与联合国听证会报告》。美国政府和国会提交的报告见于: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earing: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UN Reforming*,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从1985年起,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对系统研究联合国投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外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有专门的联合国投票情况的资料积累。

<sup>③</sup> 除此之外,对于联合国投票的研究还有其他两种类型:一是定量研究投票行为方法和模型的分析,这类研究设计了一些测量投票能力的方法和研究投票效用的模型;二是投票模式分析,主要研究在联合国内的投票格局以及趋势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国家间在联合国投票一致率的研究主要适用于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由于特殊的投票原则,并不适合进行此类研究。为了保证正常运转,安理会采取一票否决制度,实质上体现了大国一致的原则,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倾向于合作,而不轻易使用否决权。同时,冷战结束后安理会非正式磋商开始增多,大国在会前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对相关议案达成一致,在投票上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率。所以,在安理会,投票一致率的高低无法代表国家间在特定议题上观点或利益分歧的大小,也就是说,国家间在安理会的利益斗争和交换并没有体现在投票数据上。因此,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冷战结束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特点以及影响两国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为此,本文考察了1991—2006年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使用统计学方法,对研究中美在联合国的投票问题做出新的尝试。

## 二、影响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因素

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既定问题上的政策原则是其在联合国投票的基础和依据,国家既定政策之间的差异是影响国家间在联合国投票一致率的主要因素。但是,研究人员同样发现,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实践中,存在某些因素影响一国的外交决策,使国家的投票行为偏离既定的政策原则,出现投票立场和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影响国家间的投票行为。特别是美国一直力图在联合国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强大实力影响其他成员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采取各种方法游说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投票保持一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

### 观点一、民主程度的提高会提高一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

一些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化上的亲近会提高国家间的投票一致率。斯托姆·萨克尔(Strom C. Thacker)指出,国家的民主程度可以影响它们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如果一个国家越来越民主,它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也会发生改变<sup>①</sup>。埃力克·沃顿(Erik Voeten)认为“西方—非西方”因素是分析联合国大会内投票集团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西方国家是民主国家,因此,他们属于同一个投票集团,而非西方国家大多是非民主国家,因此,他们的投票模式更为相近<sup>②</sup>。有研究把民主程度、政府的政治取向、腐败和官僚体系作为检验文化和政治因素的指标,检验结果显示,越民主的国家与美国的投票越趋于一致<sup>③</sup>。

### 观点二、综合国力的提高会降低一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

一些学者认为依赖外国支持的国家在投票上可能会更加符合其援助国的立场。当一国处于政治不稳定或是私人资本普遍流通不畅的时期,它的对外依赖程度会增强,因此,这样的国家比较容易在投票上与强国保持一致以换取援助<sup>④</sup>。有学者设计了一系列用于检验依赖国外支援因素的指标,即综合国力、海外债务、通货膨胀、预算平衡、人均GDP、GDP增长速度和进出口额,检验结果显示,综合国力与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投票一致率有较高的相关性,综合国力的提高会降低一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sup>⑤</sup>。

### 观点三、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能够提高受援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

美国的双边援助能否提高受援国与它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这是一个受到广泛关

<sup>①</sup> Strom C. Thacker, "The High Politics of IMF Lending", *World Politics*, Vol.52, 1999, pp.56-59.

<sup>②</sup> Erik Voeten,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2, 2000, pp.197-204.

<sup>③</sup> Axel Dreher and Jan-Egbert Sturm, "Do IMF and World Bank Influence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CESiof Working Paper, No. 1724, Category 2: Public Choice, 2006, pp. 32-33.

<sup>④</sup> John Oatley and Bruce Russett,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432-436.

<sup>⑤</sup> Ibid, pp.13-20.

注和争议的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没有定论<sup>①</sup>。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美国通过世界银行进行的多边援助能否影响受援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阿克塞尔·德尔 (Axel Dreher) 和简-艾伯特·斯特姆 (Jan-Egbert Sturm) 考察了 1970—2002 年间在联合国大会上 188 个国家与美国的投票情况，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世界银行的贷款可以显著提高受援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一致率<sup>②</sup>。

观点四、双边关系的波动会影响两国投票一致率的高低

有学者各国在联合国政治和安全事务中采取的合作或不合作投票行为都是受国家间关系的当时状况制约并服务于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也就是说，双边关系的波动可以影响两国在联合国内投票一致率的高低<sup>③</sup>。

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政策原则的改变毫无疑问会影响本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那么，除了既定的政策原则，上述的四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冷战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使得投票行为偏离既定的政策原则呢？这就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民主程度来说，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政体上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受到控制的变量；从综合国力的变化来看，冷战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陆续赶超世界大国；从援助因素来说，中国从 1981 年开始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截止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 422 亿美元，共支持了 284 个发展项目，目前执行中的项目有 70 个，贷款规模在世行位居前列<sup>④</sup>；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说，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波折，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因此，综合国力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波动都是需要研究的变量，那么，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考察这三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

### 三、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一) 指标和变量关系

本文将使用统计学方法考察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变化、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中美关系的波动这三个因素与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从而判断这些因素是否对冷战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产生了影响。

本文把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 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两国综合国力变化的指标，世界银行每年给中国的贷款额作为衡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援助的指标，中美关系每年的分值作为衡量中美关系波动的指标。

本文把冷战结束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的一致率和重要投票的一致率(包括传统算法和变化算法)作为衡量冷战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指标。

变量关系表示如下：

自变量	因变量
-----	-----

<sup>①</sup> 一些研究认为双边援助无法影响受援国的投票行为，也有一些学者找到双边援助和国家投票抑制率之间的积极联系。加藤冒克 (Masakatsu Kato)、查尔斯·凯格利 (Harles W. Kegley) 和史蒂文·虎克 (Steven W. Hook)、艾德文·萨克通 (Edwin A. Sexton) 和特伦斯·达克 (Terence N. Decker) 等认为，美国的援助对受援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没有产生影响。而塞缪尔·伯恩斯坦 (Samuel J. Bernstein) 和尤金·艾尔伯特 (Eugene J. Alpert)、库尔·雷 (Kul B. Rai)、朗博德 (Per Lundborg) 和 T.Y.王 (T. Y. Wang) 则认为美国的援助提高了受援国与它的投票一致率。

<sup>②</sup> Axel Dreher and Jan-Egbert Sturm, "Do IMF and World Bank Influence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pp.32-33.

<sup>③</sup> 朱立群：《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49页。

<sup>④</sup>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Projects/projects.htm>.

中美两国 GDP 的比值	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的一致率 联合国大会重要投票的一致率 (包括传统算法和变化算法)
世界银行每年给中国的贷款额	
中美关系每年的分值	

表-1 变量关系

本文将分两种情况考虑，第一种是考察中美两国 GDP 的比值、世界银行的贷款额和中美关系是否会影响中美两国当年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第二种是考察中美两国 GDP 的比值、世界银行的贷款额和中美关系是否会影响中美两国次年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计算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三个自变量与三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显著，同时斜率显示为正，我们就可以判定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或中美关系的波动能够影响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

如果相关系数都不显著，我们则可以判定这三个自变量与三个因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即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和中美关系的波动都不影响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

### (二) 确定研究投票的选择范围

本文要考察 1991—2006 年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只包括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涉及具体投票过程的研究，如中美双方在非正式会议中的磋商情况等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联合国大会方面，学者研究的投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点名投票，另一类是重要投票。以往的研究显示，研究不同类型的投票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为了保证结论的全面性，本文把这两类投票都作为研究对象。

在本文中，点名投票指的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全体会议和主要委员会进行的通过率在 90% 以下的投票，一致通过或是实际上一致通过的投票（这里定义为超过 90% 的国家持同种观点的投票）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共有 1228 个投票。

重要投票指的是那些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议案的投票情况，这些议案是美国国务院从联合国大会表决的所有议案中挑选出来的，一般每年有 10—16 项，内容大多涉及人权、中东地区、人权等领域。美国政府把重要议案的投票一致率作为衡量其他国家对美国支持程度的量度标准，要求外交人员在联合国进行重点游说，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在重要议案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因此，在考察中美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时，两国在重要议案上的投票一致率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共有 205 个投票。

### (三) 确定研究数据的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包括投票数据、关系数据、综合国力 (GDP) 和贷款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 4 份资料：

#### 1、投票数据的资料来源

本文的投票数据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以下简称“四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和重要投票的一致率，这些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年度报告<sup>①</sup>。

#### 2、关系数据的资料来源

<sup>①</s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to Congress on 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85-2006*, 美国国务院 1997 年以后发表的《联合国表决情况》全部可以在其网站上查阅, <http://www.state.gov/p/io/rls/rpt/>。这份资料记录了 1984 年以来, 所有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的投票情况。该资料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分为全体投票和重要投票, 计算其他国家在这两类投票上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 比较各国和各个国家集团与美国的投票情况。

本文的关系数据是指每年中美关系的分值, 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与大国关系衡量》(阎学通编著) 的中美关系历史分值的数据库<sup>①</sup>。本文对阎学通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由于联合国大会一般在每年的 9—12 月召开, 因此, 本文将中美关系的年分值定为这 4 个月分值的平均值, 转化公式为:

$$Y = \frac{1}{4} \sum_{i=1}^{9-12} M_i$$

其中,  $Y$  = 中美关系的年分值,  $M_i$  = 该年中美关系的月分值。

### 3、贷款数据的资料来源

本文的贷款数据是指世界银行每年对中国承诺贷款的金额, 这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年度报告》<sup>②</sup>。这份资料整理了每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承诺、支付和净转移额, 本文把 1991—2006 年期间世界银行每年对中国的承诺额作为研究对象。

### 4、综合国力的资料来源

本文把冷战后中美两国 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两国综合国力变化的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美元) 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sup>③</sup>、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世界银行网站。

#### (四) 确定计算两国投票一致率的方法

在学术界, 主要有两种计算投票一致率的方法。第一种是传统算法, 查尔斯·凯格利 (Charles W. Kegley) 和史蒂文·虎克 (Steven W. Hook) 把两国投票一致的议案赋值为 1, 把投票不一致和投弃权票的议案赋值为 0<sup>④</sup>,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不考虑投弃权票或是缺席的情况, 只计算两国同时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票的情况, 计算公式为:

$$F = \frac{M}{N - B} \times 100\%$$

其中,  $F$  = 投票一致率,  $M$  = 两国投票一致的议案数,  $B$  = 投弃权票或是缺席的议案数,  $N$  = 总议案数;

第二种是变化算法, 斯托姆·萨克尔 (Strom C. Thacker) 等学者将两国投票一致的议案赋值为 1, 投票不一致的议案赋分为 0, 投弃权票或缺席的议案赋值为 0.5<sup>⑤</sup>, 这种方法实际上把投弃权票认为是避免投票不一致的行为, 计算公式为:

<sup>①</sup> 阎学通等著:《中国与大国关系衡量》, 即将出版。阎学通认为, 国家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国家间的事件表现出来, 因此, 事件数据分析可以成为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 而事件数据分析的核心, 就是如何把双边关系中的事件转化为可以定量处理的数值。阎学通的研究把对事件影响力进行积累作为衡量的起点, 测量事件影响力随着时间流动的变化作为衡量的过程, 双边关系现状作为衡量的终点, 提出事件影响力的分值公式, 根据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列出了事件分值基准表, 解决了从事件赋值向关系赋值的转化。阎学通统计了 1950—2006 年中美关系中相关事件, 将其与事件分值基准表中的标准对照进行赋值, 然后算出事件影响力的具体分值, 在此基础上给出每月中美关系的分值, 形成了中美关系历史分值的数据库。这是我国第一次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量化数据库, 对定量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up>②</sup> 《世界银行年度报告》(1984—2006), 由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编辑。这份资料由国际复兴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执行董事会根据这两个组织的附则编制, 记录世界银行每年的主要计划、业务与管理以及财务状况。

<sup>③</sup> 《国际统计年鉴》是一部综合性国际经济、社会统计资料书, 收录了世界多达 160 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 对其中的 40 多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和世界主要企业的基本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其中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本文有关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1991—2001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1999》、《国际统计年鉴 2003》, 2002—2004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 国际统计数据, 2005 和 2006 年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http://www.worldbank.org>。

<sup>④</sup> Charles W. Kegley and Steven W. Hook, "U.S. Foreign Aid and UN Voting: Did Reagan's Linkage Strategy Buy Defence of Defi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3, 1991, pp.301.

<sup>⑤</sup> Strom C. Thacker, "The High Politics of IMF Lending", pp.52.

$$F = \frac{M + \frac{1}{2}B}{N} \times 100\%$$

其中，F=投票一致率，M=两国投票一致的议案数，B=投弃权或是缺席的议案数，N=总议案数。

本文的投票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的年度报告，这份资料在计算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不考虑投弃权票或是缺席的情况，只计算两国同时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票的情况，因此，文中所有的投票数据，包括中美在联合国大会上点名投票的一致率和重要投票的一致率都是传统算法计算的结果。埃克塞尔·德尔 (Axel Dreher) 和简·艾伯特·斯特姆 (Jan-Egbert Sturm) 认为计算投票一致率的方法会影响最终的结论，在研究中选择不同的算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不同<sup>①</sup>。而且，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投弃权票或缺席的情况比较多，传统算法不考虑投弃权票或是缺席的情况，可能无法如实反映出中国的立场。因此，为了保证结论的准确，在计算中美在重要投票的一致率时，由于样本较少，我采用传统算法和变化算法分别进行计算，并将结果进行比较，观察两种方法对结论的影响；而在点名投票的一致率计算中，因为资料的局限，加上样本较多，我仅采用传统算法来计算。

#### 四、既定议题的政策是影响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

##### (一) 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sup>②</sup>

##### 1、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的特点

通过图 1，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在联合国大会的点名投票中，中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处于较低水平，保持在 10%—30% 之间，是四国中与美国投票一致率最低的国家。同时，中美的投票记录比较稳定，即使经历 1996 年台海危机、1999 年炸馆、2001 年撞机等突发事件，变化幅度都在 10 个百分点以内。与中国不同，法国、英国与美国一直保持 50% 以上的高一致率。俄罗斯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变化较大，从 40% 快速上升到 73%，与法、英的水平相近，1996 年以后，两国的投票差异开始扩大，但仍高于同时期中美两国的投票一致率。

---

<sup>①</sup> Axel Dreher and Jan-Egbert Sturm, “Do IMF and World Bank Influence Vot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pp.9-10.

<sup>②</sup> 除了分析中美的投票情况，本文将俄罗斯、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投票情况作为参照，原因是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与中国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国家，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比较俄罗斯、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投票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中美两国的投票一致率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相对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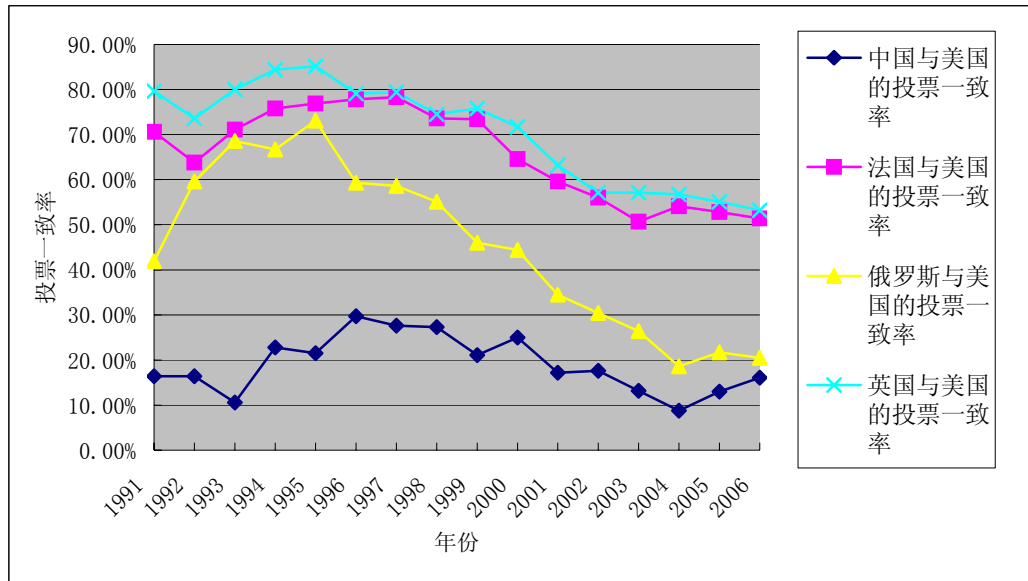


图-1 四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的一致率（1991—2006）

## 2、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重要投票的特点

先看传统算法的结果，通过图 2，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在联合国大会的重要投票中，五国的投票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四个国家中，中国与美国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最大，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投票模式最为接近，而俄罗斯的变化较大。

冷战后，中美两国的投票平均一致率只有 16%，相比之下，英国、法国与美国在重要投票上的平均一致率都在 75% 以上。虽然从 1997 年开始，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投票差距有所扩大，但仍然与美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冷战结束之初，俄美的投票一致率迅速提升至较高水平，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俄美两国的投票一致率连续降低，但在重要投票上的平均一致率也在 50% 以上。

中美之间的投票差异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冷战结束后的 7 年内，中美的投票差距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国的投票一致率一直在 10% 左右；1997 年以后中美的投票差异有所缩小，但波动较大，从 2000 年开始，两国的投票差异持续扩大。2000 年以后，中美的投票一致率达到 22 年来的最低点。

同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重要投票上的一致率最低，平均一致率只有 8%。与中国类似，小布什政府时期法国、俄罗斯和英国与美国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都有所拉大。

变化算法的结果与传统算法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四国与美国投票一致率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投票变化的幅度也有所降低。就中美的投票一致率来看，变化算法的数值比较高，投票行为变化的幅度也相对较低。虽然两种算法计算的数值有差别，但结论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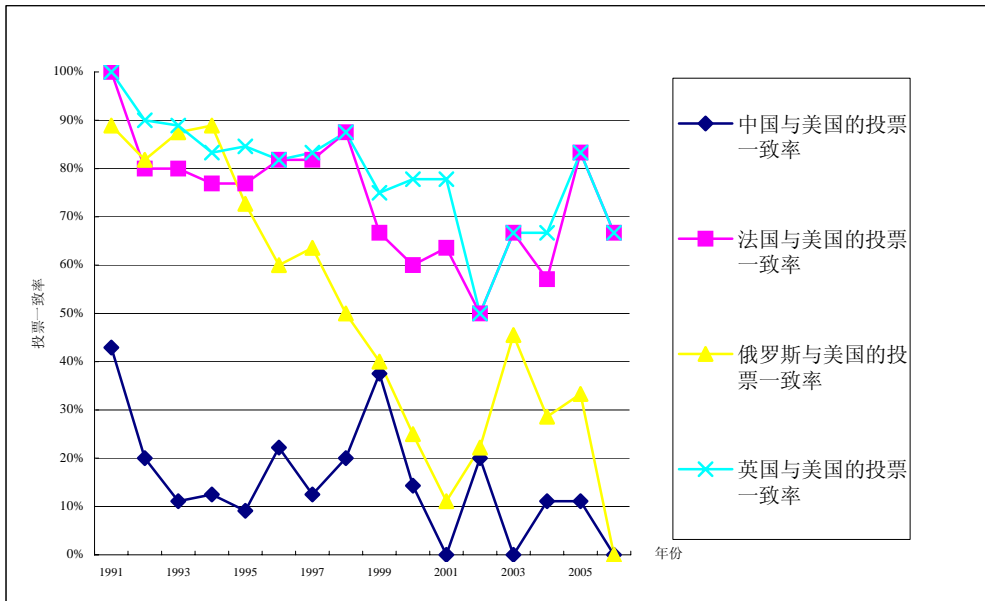


图-2 四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重要投票的一致率 (1991-2006) (传统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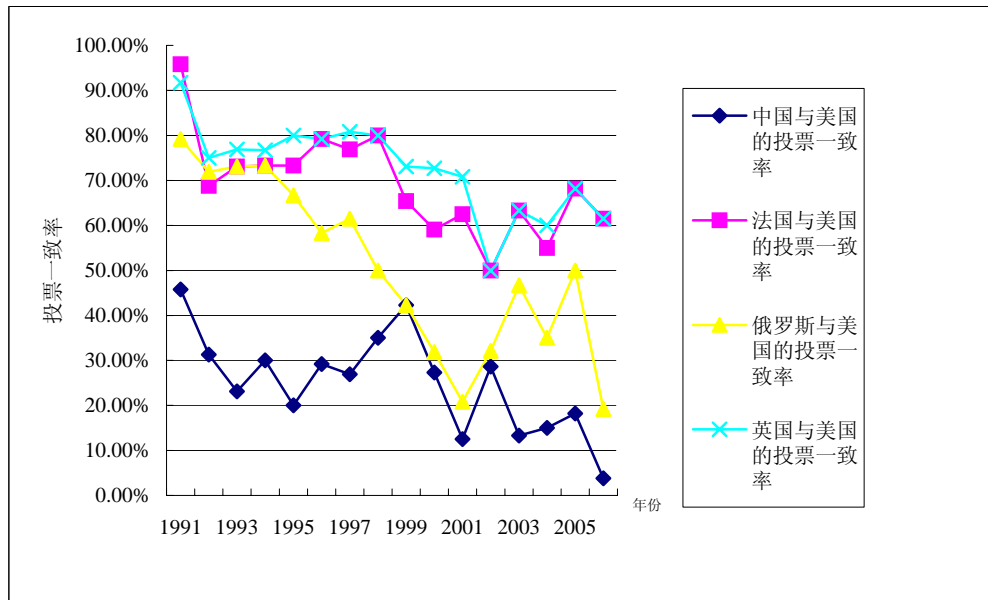


图-3 四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重要投票的一致率 (1991-2006) (变化算法)

(二) 冷战后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中美关系的波动不能影响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中美 GDP 的比值、世界银行的贷款、中美关系分值这 3 个因素和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点名投票一致率、重要投票 (包括传统算法和变化算法) 一致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点名投票一致率	重要投票一致率 (传统算法)	重要投票一致率 (变化算法)
时期	1991-2006 年	1991-2006 年	1991-2006 年
投票议案	1228	205	205
中美 GDP 比值	- <sup>①</sup> 0.0318	-0.2403	-0.4577
中美 GDP 比值	-0.0329	-0.0985	-0.3037

<b>【t+1】</b>			
世界银行的贷款	0.2423	0.0276	0.1169
世界银行的贷款	0.4905	0.1604	0.3227
<b>【t+1】</b>			
中美关系	0.0859	-0.0763	-0.0441
中美关系 <b>【t+1】</b>	0.0043	0.1994	0.0537

表-2 中美 GDP 的比值、世界银行的贷款、中美关系分值与中美投票一致率之间的相关系数<sup>②</sup>

通过表 2，我们可以看到，计算结果否定了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无论计算是当年还是次年投票一致率和中美 GDP 的比值、世界银行的贷款、中美关系的历史分值的相关性，得出的相关系数  $r^2$  都很低。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这 3 个因素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一致率之间没有相关性，冷战后中美综合国力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贷款和中美关系的波动都不影响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冷战后在联合国大会，中美两国的投票主要还是遵循本国在既定议题上的政策原则，两国的投票差距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政策原则的差距。

### （三）原因分析

为什么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遵循本国在既定议题上的政策原则呢？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冷战后中美没有把联合国大会作为两国较量的场所。虽然冷战后中国的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没有因为自身实力的增强而对美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同样，美国虽然把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最大对手，但是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美国没有利用强大的实力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中国和其投票保持一致。

同时，美国利用贷款援助改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无效的，这里存在 2 个可能：一是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其游说政策的对象，另一个是美国的游说政策对中国不成功。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不会倾向接受美国的游说而改变自己的投票行为。

第二、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分歧不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在联合国大会上，中美两国的投票都来自于本国对特定议题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相对来说是成熟和稳定的，中美两国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随机因素和偶然事件，虽然会引起中美双边关系的波动，却很难影响两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基本态度。同样，中美两国也并不会因为在联合国大会特定议题上的分歧，从而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 五、结论

本文分析了 1991—2006 年期间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以及影响因素，通过研究中美在联合国大会近 2000 个决议的投票记录，使用统计法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投票情况来看，冷战后中美两国的整体利益变化不大，但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加大。冷战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在整体上是稳定的，不同总统任期内两国的投票一致率相差不多，这表明冷战后对于联合国大会上讨论的国际问题，中美两国的态度在整体上比较固定。但在与美国核心利益相关的投票上，中美在小布什任期内的投票一致率低于克林顿时期和老布什时期，这表明中美两国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扩大。

第二、冷战后，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主要遵循本国在既定议题上的政策原则，两国的政策原则差距越大，投票一致率就越低。虽然有研究认为美国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一定的外交政策影响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但是本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变化、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提供中国的援助贷款以及双边关系的波动都不影响中美两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

第三、冷战后，联合国大会没有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场所。中美两国不会因为双边关系的恶化而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上报复对方，也不会因为双边关系的好转而迁就对方，中美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